



沙晚1907年拍摄的武梁祠两座石阙

观史

1891年春，26岁的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晚站在嘉祥县紫云山脚下，眼前是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汉代石祠——武梁祠。这是他第一次实地考察这座在中国金石学界久负盛名的汉代祠堂。

宋代文豪欧阳修曾收藏了一张武梁祠出土的武班碑拓片。1064年5月8日，他特为这张拓片撰写了一篇短文，感叹碑铭字画残泐，推断此碑立于建和元年(公元147年)。

宋代金石学家、藏书家赵明诚也致力于武梁祠研究，是最先提到武氏家族石祠的金石学家。他解读武班碑铭，凭借这些文字描述，大致了解了武班的一生。除此之外，他还把石阙铭文辨认出来，并将铭文全部抄录下来。赵明诚注意到武氏家族在任城一带有好几处墓家。他收藏有武开明碑拓片，也正因此，后人才能看到武开明碑铭的片段。

沙晚身着长衫，手持毛笔与拓纸，与助手一同测量、绘图、拓印。他对石刻上的画像与铭文如数家珍，一边记录，一边与当地碑贾攀谈，试图还原这些石刻的原貌与流传脉络。

沙晚为何如此痴迷武梁祠？这要从他与中华文化的渊源谈起。

沙晚生于1865年，1918年去世，活了五十三岁。他祖籍是法国和瑞士交界的上萨瓦地区。沙晚的爷爷因信仰问题被迫迁居到瑞士，沙晚实际上从小是在瑞士长大的。他的母亲大概在他出生一个月后就去世了，父亲再婚，之后又生了八个子女。

沙晚中学时回到了法国，他父亲后来在里昂做工程师，他就在里昂读了初中、高中，后考入法国文科的顶尖学校——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在巴黎高师学的是哲学，当时的校长很快就注意到沙晚的才华，他认为那个时候整个研究方向在向东转移，就建议沙晚去学点东方的语言，所以沙晚当时就在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中文，同时在法兰西西学院旁听德里文侯爵讲的汉学讲座。

沙晚学汉字的入门工具书，不是当时国内流行的《说文解字》，而是便于在西方拼音文字语境中学习汉语的明代分韵类书《五车韵瑞》。沙晚从小学入手的研方法，明显受乾嘉学派影响，但沙晚更进一步，把所利用素材范围拓展到满、蒙、藏等少数民族语言。

沙晚大学毕业的论文是研究康德自然哲学，而且他非常希望进一步研究中国哲学，他去东方语言学校咨询老师考迪。考迪回答说，经学研究已经有人了，而且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你还不如去看看历史，中国历史现在还是个薄弱环节，沙晚记在心里，但还是有些许犹豫。

从文献到田野：翻译《史记》与实地印证

1889年，沙晚大学毕业以后，因为他学了一点儿中文，经过老校长的举荐，在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得到了一个随员的差事。所谓随员就是没有固定的工作，当翻译，整理一些资料，这为他阅读创造了大量的时间。1889年7月12日沙晚到达北京。一到就给考迪写信，说起初对自己的工作有些犹豫，看了《礼记》，但是翻译这本书的难度太大，只好放弃；退而研究司马迁，就是觉得稍微容易一点儿，打算先翻译这本著作的第一部分，从神农直到汉朝，也就是本纪。接触司马迁后，他便入迷了，翻译的第一篇是《封禅书》。他在北京的四年已经完成《史记》翻译的第一稿，而且在1890年发表了《封禅书》的第一个译本，是单行本。

1891年沙晚曾前往泰山考察，以印证《史记·封禅书》的记载。此行还促成了他对泰山祭祀活动和民间信仰的通盘研究，最后写成了《泰山：中国的一种祭祀志稿》一书；同时他在泰安碑贾手中买到武梁祠、孝堂山、刘家村的画像石和碑刻，构成了他另一本书的主要素材，即《中国两汉石刻》。

在沙晚藏书中，有“狮城”“博士”“中文教习”“沙晚”“滋兰”等印章。当外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化从理解变成痴迷时，就开始像中国文人那样读书。沙晚的名字藏着不少研究线索。沙晚是音译，为什么用田字旁的“晚”？沙晚藏书里“滋兰”印章可以给出注解。

“滋兰”出自《楚辞·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这句话在中国文化语境里，经常被用作赞扬老师培养了好多好学生。沙晚在巴黎的主要工作是中文教师、汉学教授，因此他用‘滋兰’‘沙晚’来表达这个意思。”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正宏说。

沙晚从《史记》入手时，越发感觉理解这部“史家之绝唱”，不能仅靠书斋中的训诂与校勘，还需走进汉代遗迹，用实物印证文字。

此时，武梁祠便进入他的视野。武梁祠汉画像石可以说是后世梳理文化脉络，勘正经史的重要线索。武梁祠保存着汉画像题材中唯一的一幅远古帝王图，十一位古代君王，伏羲、女娲、祝融、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和夏桀，按照时间顺序依次亮相，上古帝王款款而来。人类始祖伏羲、女娲手持规矩，创立了世间法则，给予文明以尺度。祝融教会人类使用火，自此人类吃上熟食。神农遍尝百草，教会人类耕作。黄帝“多所改作，造兵井田，垂衣裳，立宫宅”，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此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舜“耕于历山，外养三年”。图像配以简洁的榜题文字和寥寥几幅画面，便囊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整幅画像，就是《史记·五帝本纪》的缩写版，与《史记》图文互证。

由此，沙晚自发走向武梁祠。他将画像石上的铭文与史书对照，试图还原汉代祭祀制度与思想观念。他注意到，武梁祠的铭文不仅记载了墓主生平，还包含大量典章制度与儒家伦理，是研究汉代社会结构的重要材料。

重访武梁祠：追随司马迁的学术传统

1907年7月，沙晚再次踏上嘉祥县的土地，重访武梁祠。此时，他已是一位享誉欧洲的汉学大家，但面对石刻，仍如初见般虔诚。

“7月5日下午和7月6日上午，我又把在十六年前看过的武梁祠石刻画仔细研究了一遍，不过7月5日那天，天公不作美，上午一直在下雨，而且雨下得特别大，但我还是对两座石阙做了完整的拓片，在文物市场上看到的拓片仅展现石阙的一面。此外，在西阙前不远处，我看到一块画像石上三面都雕刻着图像，于是便把图像拓制了下来。”沙晚如此记录。

由于前次考察条件所限，沙晚仅能依靠手绘示意图记录图像。此次，他带来了便携式照相设备，决定用科学图像完整再现武梁祠的原貌。

除了留下珍贵的影像，沙晚还拓下武梁祠大部分的画像石，并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如在河伯出行图中，他写道：“在此我们似乎来到了水的王国。在两条大鱼拉的车里端坐着一个大人物，他手里拿着一个‘符’，身后是御者；一人站在车后，另一人跪在前，两人手里都捧着笏板。在这几个人物四周，各式各样的水生动物排成队列，朝一个方向游动，其中有青蛙、乌龟、水鼠、鱼等，这些水生动物长着长矛、戟、利剑和盾；还有人骑在鱼背上，另有一些奇怪的生物，长着鱼身青蛙头或鱼身人面；还有四爪龙，带蛇尾小精灵；左边涌出一股巨大的浪潮，一群群鱼在游动。”

接着，沙晚给出自己的结论：坐在车里的神话人物就是家喻户晓的黄河水神河伯。刘向在《说苑》里这样写道：“夫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



爱德华·沙晚

沙晚不仅关注图像本身，还详细记录石刻所处环境、建筑结构及流传过程。他特别指出，武梁祠虽已毁，但石阙仍立于墓地神道入口，是研究汉代墓葬制度与空间布局的重要依据。

1909年，沙晚将考察所得照片整理成书，其中武梁祠图像占据重要篇幅。他指出，武梁祠画像石不仅具有艺术价值，更是研究汉代宗教、政治与社会思想的重要资料。他特别强调，这些石刻所展现的神话与历史场景，是中国艺术最古老的纪念碑之一，与亚述浮雕风格有密切联系。

沙晚继承了他所景仰的司马迁所“践行”的学术传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把实地的田野考察和书房里的潜心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研究的过程中，同时实地进行调查。与同时代中国金石学家“访碑录式”专注于文本收集的方式不同，沙晚的实地调查依托于现代学术的考古学方法，不仅对碑刻本身做详细的测量和记录，同时对碑刻或古物所在的祠堂、墓地、周边环境等做仔细的考察和分析。再加上西方的照相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沙晚的《华北考古记》最终成为划时代的学术丰碑，他本人也由此成为汉学研究的一代大师。

沙晚用脚步丈量中国大地，用镜头记录汉代遗迹，用译笔沟通中西文明。他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是真正的参与者。他与武梁祠的缘分，不仅是一段学术旅程的见证，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正所谓，西儒观武梁，汉画复东来。

西儒观武梁 汉画复东来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实习生 杨海晴

初识武梁祠：1891年的山东之行

《大刀记》：书写鲁西北抗战英雄传奇

抗战文艺

□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大刀记》这部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抗日文学经典，以鲜活的人物和精彩的故事，勾勒出中华民族不屈的抗战精神，不断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

“把黑暗的旧社会揭个体无完肤”

《大刀记》作者郭澄清从创作设想到最终成稿，耗时十多年，又历经各种波折，终于在1975年出版。

郭澄清是在炮火中长大的一代作家。郭澄清8岁时，日本侵略者轰炸了天津县城，他看到了日军的种种暴行，也看到当地百姓拿起长矛大刀积极抗日的场景。长大后，郭澄清响应

号召参军入伍。济南战役后，他留在济南任教。1950年，为了给文学创作积累素材，郭澄清要求离开济南，回到天津一边从事教学工作，一边写作。“当时我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决心通过自己手中这支笔，把黑暗的旧社会揭他个体无完肤，把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闹翻身的丰功伟绩著书立说，向全世界宣告。”郭澄清利用与人下棋、下乡采风的机会，搜集抗战素材。为了创作，他甚至住到一位大刀队老战士的家里。白天劳动，晚上听故事，《大刀记》的架构慢慢在他的脑海里成形。这部小说从清末民国时期写到抗日战争胜利，记述了农民群众所遭受的“三座大山”压迫，以及梁永生、沈万泉等人的反抗斗争精神。因为小说中有真实的历史、生活，作品一出版，就深受读者喜爱。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宗刚认为，郭澄清在创作《大刀记》时，非常重视生活的作用，把生活直接熔铸到文学作品中，这使得作品具有了某些史诗性的品格。“郭澄清将个人的家族

历史和鲁西北的历史有机地结合，让我们通过一个家族和地区的历史看到了中国历史。”

字里行间有山东人的精神传统

抛开《大刀记》在文学史上的重要价值，这部作品能经得起时间考验，成为红色经典读物，还因为它确实鲜活、可读，在讲述抗日故事上独具匠心，有其独特魅力。

《大刀记》由血染龙潭、巧夺黄家镇、夜战水泊洼等诸多核心单元故事组成，吸纳的是《水浒传》这类古典传统小说环环相扣、斗智斗勇的叙事模式。小说中的武艺、武术的传承，让读者有读侠义江湖和英雄“养成”的熟悉感。小说中，梁永生巧妙脱险、梁志勇“打虎遇险”等，情节跌宕起伏，有着传奇小说的阅读韵味。小说宏大的视野、史诗叙事，又让其有《创业史》《红旗谱》等经典长篇的波澜壮阔和厚重深邃。《大刀记》还运用很多鲁西方言、民谣，读起来爽朗又亲切，有山东人

的精神传统。

《大刀记》出版后，不断被改编成话剧、连环画、评书等多种艺术形式。据不完全统计，小说《大刀记》发行400多万套；广播剧在全国几十家省级电台播放。

电影版《大刀记》1977年上映，故事悬念迭生，引人入胜。影片对梁永生的刻画，更加突出其英雄性，他刀枪不入、临危不乱，是一个标准英雄式人物。影片的一个亮点是，将生活与革命融合，除了精彩战斗戏份，元宵踩高跷、舞狮子，运河决堤穷人卖儿求生，主角一边逃难一边打铁、干苦力谋生等，都能看到当时社会的多面生活。在文艺比较匮乏的年代，电影《大刀记》有很多艺术上的突破。

李宗刚说，《大刀记》的成功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有很多启发。“作家应有为文学而献身的精神。”李宗刚解释，郭澄清在创作《大刀记》时抗拒了种种功利性诱惑，割舍掉城市优越的生活，回到农村。“作家要有深潜于民间，深入到人民火热生活中去的决心。”



找桥回澜阁



沙梁文昌阁

青岛“姊妹阁”往事

□ 鲍福玉

作为青岛最负盛名的地标之一，找桥回澜阁每逢旅游旺季便游人如织，飞檐下涌动着拍照打卡的游客。这座由建筑大师刘铨法设计的八角亭阁，已成青岛的视觉符号之一。然而，在青岛平度南村镇的沙梁村，另一座同样出自刘铨法之手的建筑——沙梁文昌阁，却如一位静默的隐士悄然伫立，不为人熟知。这对“姊妹阁”虽共享着相同的设计基因，却境遇殊异。沙梁文昌阁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刘铨法，青岛近代建筑史上不可忽视的名字。这位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的建筑师，在国内首次采用预制混凝土构件和水泥制品代替传统木料制作，青岛现存的20世纪30年代的经典建筑，不少都是出自他手。1933年，他参与设计的找桥回澜阁落成，八角形两层阁楼，屋顶覆盖黄色琉璃瓦，檐角翘然，搭配盔顶造型，整体呈现传统建筑的庄重感，被世人奉为经典。鲜为人知的是，就在回澜阁落成一年后，刘铨法在平度又留下了另一座八角形阁楼——沙梁文昌阁。这对“姊妹阁”的命运从诞生之初便走向分野。回澜阁凭借找桥的地理优势与城市象征意义，迅速成为青岛的视觉核心；而沙梁文昌阁，因地理位置偏僻、功能定位特殊，渐渐湮没在时光深处。

沙梁文昌阁位于沙梁村的中心大街十字路口西侧，阁身呈八角形，共两层，八面攒尖琉璃瓦顶。“文昌阁高18米，自上而下为实墙，塔身内部以钢筋混凝土构成八根立柱为支撑，并筑造水泥钢筋墙，外墙辅以水磨青砖。”平度南村镇文化站站长杜法好介绍，文昌阁与回澜阁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细细看来又各具特色。记者在现场注意到，文昌阁上下两层建筑风格相同，门、窗均为砖雕半圆窗，砖雕内容均不同，有桃、佛手瓜、龙、葫芦、石榴等图案。窗楣上方则有砖雕盘子，是以孝悌为内容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通过精湛的砖雕技艺呈现，既美化了建筑，又以生动的方式传递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层门楣上方置有大理石匾额，刻有清末举人诸邦靖所书篆书“佑我文明”，字体古朴苍劲，彰显对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祈愿；二层门楣上方的匾额是著名书画家陈鹤所书的“文光射斗”，笔力雄浑，寄托着对文化昌盛、人才辈出的美好期许。

“阁顶的斗拱飞檐，全部为水泥预制构件，制作极为精细。”杜法好说，中国传统阁楼多以砖木结构为主，完全以砖石和混凝土建造阁楼极为少见。沙梁文昌阁在建筑材料和工艺上的创新，不仅体现了刘铨法作为建筑师的巧思与大胆尝试，更展现了那个时代建筑技术的发展和突破，是民国时期的重要建筑。

说起修建文昌阁的历史，筹建人蔡官宸不能不提。这位从沙梁村走出去的民族商人，虽然读了五年书就辍学了，但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做生意的独到见解，在青岛农产品出口销售中异军突起，并逐渐成为行业翘楚，拥有数座大仓库和大油坊，可与日商三菱、三井、东和等财团抗衡。然而，巨大的财富并未给蔡官宸带来内心的安宁。据蔡官宸外孙徐立信介绍，长期商战的“血雨腥风”，让外祖父内心深处始终萦绕着一种莫名的不踏实感。一次偶然的机会，蔡官宸想起父亲生前的叮嘱，若有发达之日，务必重修家乡的文昌庙。蔡官宸遂决定斥资7000银圆，并募集亲朋捐助，共集万有余元巨资，郑重延请了当时名噪青岛、找桥回澜阁设计师刘铨法，在老家沙梁的十字街口建造了文昌阁。徐立信说，虽然文昌阁建造的原因颇具神秘色彩，但外祖父内心那份对文化教育的深切重视与虔诚尊崇，才是支撑其善举最真切、最朴素的想法，文昌阁八角柱头上雕刻的“克昌厥后，斯文在兹”也能体现他对文化传承的殷殷期盼。

“尽管蔡官宸自己没有多少文化，但他很崇尚文化，也很重视家乡的文化教育，所以才建造了文昌阁。”平度市文化馆原副馆长、民间文学学会会长陈传瑜说。

历经九十年的风雨，文昌阁虽已斑驳，却依然挺立在沙梁村的村头。蔡官宸或许从未想到，当年的善举竟为后世留下了一座兼具建筑美学与文化内涵的匠心孤本。它不像找桥的回澜阁那样热闹，但琉璃飞檐下，砖雕纹样里，凝固的不仅是刘铨法的营造智慧，也是一个商人对家乡文脉的虔诚供奉。

历史终究会让人记住一些东西，若你路过沙梁村，不妨也抬头看看它——那八角飞檐里，藏着实实在在的老故事。

